

覆面漫谈

杜思龙

覆面，又称面衣、面帛、面罩、瞑目、面具、复面、掩面等，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叫法很多，比如“蒙头布”“苦脸纸”等。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民族都有使用覆面的习惯，如果向前追溯，大约在距今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覆面。也可以说，使用覆面是人类的一种共同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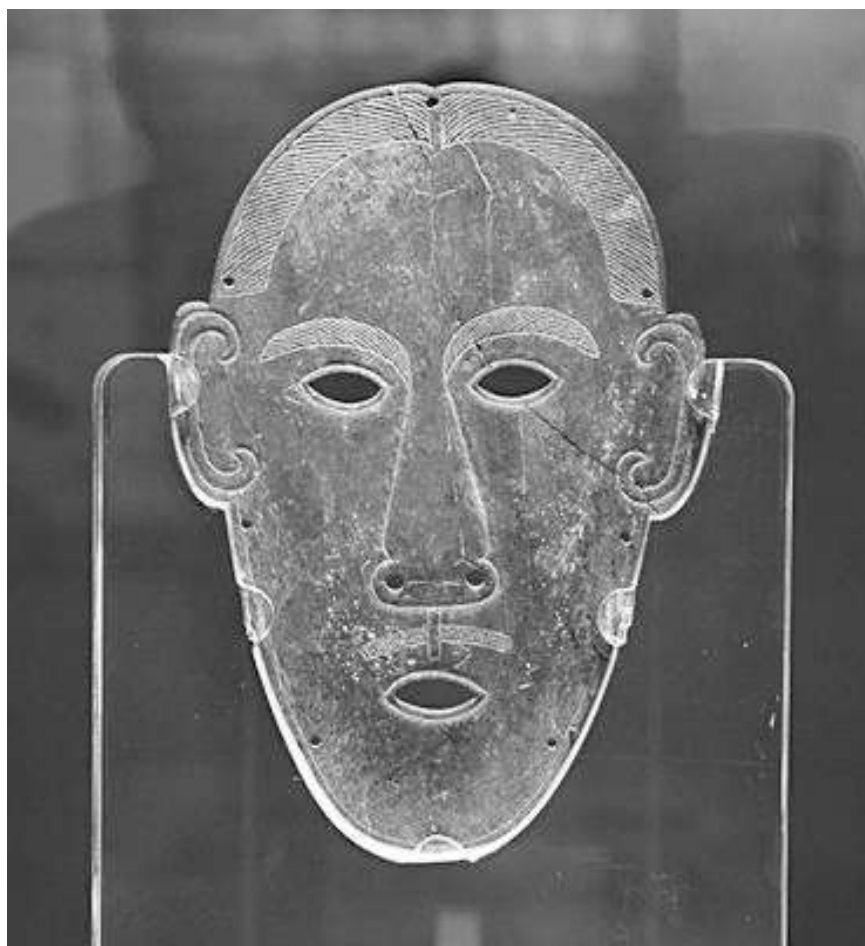
覆面的来源

关于覆面的来源，在我国流传很久的说法是战国时期吴王夫差无颜面见伍子胥而覆盖面部。伍子胥曾劝他不要攻打齐国，并警告他越国的危险，他十分生气，下令诛杀伍子胥，伍子胥被迫自杀，最后吴国被越国灭掉。我国宋代高承编的类书《事物纪原》卷九设有“面帛”条：“今人死以方帛覆面者，《吕氏春秋》曰：夫差诛子胥，数年越报吴，残其国，夫差将死，曰‘死者如其有知也，吾何面目以见子胥于地下？’乃为帛以冒面而死。此其始也。”《风俗通》曰：“吴王羞见子胥，以帛蒙面而死，故后人因之制面衣。”这种说法被好多书记载，具有传奇性，但是，很可能是靠不住的。

事实上，在吴王夫差以前早就有了覆面的习俗，夫差是战国时期人，战国以前已经有为死人覆面的习惯。从文献记载来看，《礼仪》是春秋时的礼仪汇编，已经明确写明覆面的使用。当时的覆面是黑表红里，而且中间填絮，方形。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覆面习俗了。属于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的江苏沿海地区的墓葬中出土有盖在死者面部的红陶钵。兴隆洼遗址出土了一个女孩头骨，眼眶里有两个玉珠，良渚文化时期（距今5300年至4000年）人们也就开始把玉环放到死人眼眶里随葬，其他早期文化遗址也有这种情况存在。这些都是玉覆面的早期形式。

从其他文明的使用情况来看，也能证明这一点。19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在迈锡尼遗址中发现一个黄金面具，有人认为是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面具，当然此说有争议。该面具使用黄金薄片打制而成。除了这一件，考古学家在迈锡尼遗址还发现了其他四个黄金面具，都是用金箔打制而成，时间都是公元前17世纪左右。

古埃及人很早就开始用覆面，他们在人死后会花费70天的时间制作木乃



湖北荆州秦家山M2墓用整块玉制作的玉覆面

伊，然后用长长的亚麻布包裹，最后在死者头部放上面罩。有些面罩是纯金打造的，有的是由木板制作的，上面绘有死者的面容。

古罗马也有使用覆面的习惯，就连南美洲的玛雅人也使用玉覆面，南美洲也发现了印加人使用的纯金面具。

由此可见，在死人脸上覆盖面具，是不同人种的共同习惯。人类究竟是相互学习，还是英雄所见略同，值得思考。

覆面的原因

究竟人们为什么要给死人覆面，现在有很多观点，可能各有合理性的一面，争论也比较大，谁也难以说服谁。

宋兆麟在《古代器物溯源》一书中说，人死为鬼，为生人所畏惧、惧怕，除了敬而远之之外，还要把死者脸蒙上，尽量减少人们的恐惧感，这是原因之一；其二，在死者脸上蒙一物，也是死者作为鬼者的一种符号，以便把死人和活人区别开来。

有人说，在过去确定死者是否真实死亡的手段技术不高，为防止不是真死，在死者脸部覆一块布，如果死者还有呼吸，必然有起伏，就可以及时抢救。有人说，人死后脸色会变得惨白，有的甚至会发青，看起来很难看，遮盖一下避免让人恐惧。还有人说，人死后

肠胃内的细菌没有了寄主，纷纷跑出来，用布遮挡一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它们的扩散。还有人说，给死者覆面，可以让死者脸部保持干净，避免尘埃落在脸部。这些说法都是后来人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后人附会，不是最初的原因。由于无法获取人类早期使用覆面的真实记录，他们使用覆面的真实动机确实很难知道。

还有学者认为，覆面是原始巫术的体现，巫师为防止灵魂跑出来，在死者头部加一个面罩。

覆面的材质

从已经出土的覆面来看，主要有金覆面、玉石覆面、青铜覆面、布覆面、蚌壳覆面，还有皮革覆面，新疆出土的古代楼兰美女脸上覆盖的是一张羊皮。此外，还有用树皮、树叶、陶制品做覆面的。

河北省磁县南城商代墓葬中出土一件蚌壳覆面，是一块大的扇贝，中间穿两个孔，估计是用于穿绳或带，固定在脑袋后面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墓地M2、M45墓主人头部都覆盖了一个巨大的蚌壳。不过，总体看来，用蚌壳作覆面比较少一些。

陶钵是一种早期的覆面，1985年、1986年发掘的江苏灌云大伊山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共发现17座墓主人头骨覆盖红陶钵的情况，时间距今6000年左右。陶器因为比较坚固，耐腐蚀，历经6000多年还能保存下来。我们不排除早期人类使用其他材质覆面的可能性，比如树叶、树皮等比较容易腐烂而没有保存下来。

丝织品作为覆面的考古发现，较早的是1959年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编号为M34的墓葬，该墓葬男性头骨上留有红色布纹痕迹，这座墓葬时间是齐家文化时期。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女性头骨上覆有一块梯形布片，眼睛、嘴部都留了孔。该墓为战国中期墓葬。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蔡侯利苍夫人头部也出土两块覆面，材质为绢帛。1957-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西汉墓M48夫妻合葬墓出土两件覆面，均为丝帛材料。这些文物都说明丝帛质的覆面曾经被大量使用。新疆阿斯塔那M302号墓出土的丝织品覆面四角还有四条带子，用于系在脑后，起到固定覆面的作用。很多玉覆面周围有一圈表示面部轮廓的几何形玉片，内部的一些玉片除了琢磨成五官形状，也被琢磨成一些动物形状。有些玉片两面都有纹饰，有些只有露在外面的一面有纹饰。

黄金是十分珍贵的金属，世界各种文明的人们都十分喜欢黄金，拿来做覆面表明人们对死亡的重视。比如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两件金面罩，一件覆在陈国公主脸上，另一件覆在驸马脸上。1018年陈国公主去世。这两件金面具是用整块黄金打制的，十分精致，写实程度很高。根据考古发现，辽代贵族使用金面具具有普遍性，而且沿袭已久。

有些黄金面具还会镶嵌一些宝石，1997年考古人员在新疆昭苏县发现一件黄金面具，眼睛的瞳孔镶嵌了两颗大大的红宝石，眉毛和嘴上边的胡须也是由红宝石镶嵌而成，有些已经脱落，下巴和两颊轮廓线也镶嵌了很多红宝石，像络腮胡子一般。当然，由于黄金的贵重和稀少，使用黄金覆面大多是国王及贵族的专利，一般百姓没有这样的实力。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前些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距今3300年的金面具，2021年3月又出土了重达300克的黄金面具，不过，只剩了一半；四川金沙遗址也出土了金面具，时间为古蜀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这两处的金面具因为是出土于祭祀坑，所以不应该是覆面，而是作为祭祀之用。包括体积很大的青铜面具，都是祭祀用品，而不是覆面。但是，据有些学者研究分析，在古代祭祀用的面具和死后用的覆面有时候是不分的，都有巫术意义在里面。

古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的面罩是一个巨大的黄金面具。他的金面具用了11斤黄金，还嵌有天青石、黑曜石、白石英石的宝石，十分华美，可谓是举世无双。

公元1-4世纪，在罗马帝国统治埃及及时，人们习惯在木乃伊的头部放置死者肖像，这些肖像画在木板上，少数绘制亚麻布上，形象逼真，全彩色，眼睛被夸大，立体感很强。这实际上是一种木质或布面面罩。据统计，现在已经发现近千件。这些面罩在19世纪埃及的法尤姆绿洲被发现，所以被称为“法尤姆肖像”，欧洲的很多博物馆藏有法尤姆肖像画。这些肖像画由蜡漆加彩色绘制而成，虽然历经一千多年，仍然鲜艳如初。这些画像和同时期的罗马绘画风格十分接近，如出一辙，在欧洲绘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欧洲肖像画的开端。

在我国有些地区还有使用面饼覆面的习俗，在河北大名县，在为逝去的人迁葬的时候，要给逝者头骨上面覆一个面饼，上面还要画上五官。也有一些地方，覆面仅仅是一张黄纸，被称为“苦脸纸”“苦脸纸”，也被称为“阴阳纸”。

我国新疆阿斯塔那地区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覆面，大多是布料制成。条件好一点的覆一块丝绸（绢帛），再好的便是覆玉覆面或青铜覆面。也有用麻布制作的覆面，198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营盘古墓中发现一具男尸，服饰华丽，穿戴整齐，戴有一幅麻布面具，上面画有眉毛、鼻子、眼睛、嘴巴等。

考古发现最早的玉覆面出现在西周中期，出土地点是陕西宝鸡茹家庄编号为M1的墓葬，墓主人为男性，玉片上有细小的穿孔。很多玉覆面都是由很多小块玉组成的，都是缝在丝帛上面的，大部分玉片都有用于缝缀的穿孔。也有用整块玉制作的玉覆面，湖北荆州秦家山M2墓，出土一件用整块玉做成的覆面，而且琢磨出五官、头发、眉毛、胡须等。该墓也是战国中晚期墓葬。但是，这种用整块玉做成的覆面考古发现数量远远小于用多块玉石连缀而成的覆面的数量。有的玉覆面用整块玉琢磨而成，然后再切割成小块。

西周中期、晚期的玉覆面都是贵族使用，春秋时期一些诸侯也有用石片代替玉片制作覆面的情况，估计是财力不足的缘故。战国时期用石片制作玉覆面的情况开始增多。这些玉覆面做法各异，形状也不统一，组成的玉片数量也不一致。多的有70多块，少的仅有两三块。山西晋侯墓地编号为M31的晋献侯夫人墓出土的玉覆面由多达79片玉片组成，都有穿孔，面部轮廓以内的玉片被做成鼻形、眉毛形、眼形、耳形等。像这样玉覆面组件被做成五官形状的情况很多。有些玉覆面还被做成上下两层，山西晋侯墓地编号为M8的晋献侯和编号为M92的晋靖侯夫人墓玉覆面都是双层。山西晋侯墓地编号为M62墓为晋穆侯正夫人墓，出土的玉覆面由48件玉器组成，最外面一圈由24片玉片组成，大致为铲形，底部被琢成三齿状。眉毛和眼部用碧玉琢成。每片玉上都有钻孔。

南美洲碑铭神庙是玛雅人巴加尔大帝的陵墓，巴加尔大帝的面具眼睛是贝壳和黑曜石，面部由玉片镶嵌在木架上组成。墓主人手指上有玉石戒指。墓主人手中和嘴里都有大块玉石。墓主人身边还躺着两个玉人。晚期尤卡坦玛雅人、阿兹特克人也有这样的习俗。

覆面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由来已久，使用十分普遍，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李可染与《放牧图》

盛鸣



李可染 放牧图 56.5cm x 48.5cm 1957年

作为中国国家画院成立4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开篇展，在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国凤堂开幕的“李可染艺术研究展、历史文献展”展示了此前很少展出的中国国家画院首任院长李可染不同创作阶段的精品力作57件，同时又将李可染晚年的画室“师牛堂”完整复原呈现。

作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一位领跑者、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国家画院的先驱，李可染先生一生在创作实践、理论研究、教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成就卓著，他一生倡导以“大天才”下“笨功夫”，“深于思、精于勤”并身体力行之，一生致力于在传统中不断探求变革，在变革中不断发展传统。

李可染先生的创作除山水、人物外，牧牛图是他最喜爱的题材之一，他对于牛的喜爱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是因为牧童归牛最具牧歌情调，为李可染所喜爱，也是李可染先生对于牛的品格的喜爱和尊重。

李可染对于牛曾经写下过这样的题跋：“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犷犷，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华，气宇轩昂，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在他的笔下，牛的憨厚、耐劳、温顺、犷犷，代表了普通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因此，李可染画牛总是饱蘸浓墨，用笔厚重缓慢，墨色力透纸背，极具笔墨深度。

从绘画语言上来说，李可染先生的牛在笔墨上与其山水一脉相承，其用笔凝重，其用墨深厚，或行或卧，或仰首或低头，或回望或远眺，树下、水中、路边，无不姿态生动自然，充满生活气息。在表现上也特别注意牛的神态和姿态，使之充满憨厚质朴的气质。

早在20世纪40年代，李可染先生就常常去观察住所附近的牧童和牛。一直到晚年，他一直保持着观察这一最常见的农村景象的习惯，为其创作提供了无穷的源泉。

1957年，李可染先生创作了《放牧图》，在这幅画中，李可染用浓墨勾勒出牛的结构，再用浓淡不一的墨色晕染牛的腹部和背部，牧童以单线勾勒，留白与墨色浑厚的老牛形成有趣的对比。从这幅画中可以看出，李可染先生的牧牛图以简取胜，以浓淡的鲜明对比造成画面上的清新自然的感觉。这一创作方式在其他的相同题材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榕荫放牧图》，牧牛和牧童的画法几乎与《放牧图》一样，但画面又截然不同，在密林和牧童水牛之间，李可染先生通过留白的方式来构建画面，近处浓墨画就牧牛和牧童，在浓淡上形成变化，使画面上下部分既有“气”的联系，又保证了画面的空灵。

李可染的“牧牛图”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比如《柳塘牧牛图》《放牛图》《浴牛图》《牧牛图》《柳塘放牧图》《清溪境》《柳塘渡牛图》《忽闻蟋蟀鸣》《牛背闲话图》等。在这类作品中，画家巧妙使用留白，用浓墨写就牧牛，画出茂林山石，留出大片空白作水面，充分利用了“计白当黑”的传统创作技巧。

李可染先生的牧牛题材作品，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的特质和智慧。在这“实里求虚，虚中求实”的矛盾原则中，寻求黑白、虚实之间的对比和相互映衬，建构简约而不简单的艺术空间，在实与虚、显与隐、有限与无限的高度统一中，获得画面的无穷之趣、不尽之意。

李可染先生笔下的牧牛系列作品不仅表现了他对于民间牧歌情调的向往和牛品格的喜爱，而且，在这些作品中，笔墨语言的醇厚深邃与计白当黑的巧妙章法，开拓了画牛题材的新意境。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画院）



清乾隆玻璃饾金蕉叶纹盖碗



清乾隆玻璃饾金蕉叶纹盖碗

清代，无色透明玻璃饾金蕉叶纹盖碗，通高7.3厘米，口径10.7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玻璃饾金为清乾隆朝出现的玻璃工艺新品种，制品多为制作皇家御用生活用品。无色透明玻璃与金彩奕奕的纹饰相得益彰，愈显明净而华丽。

此清代无色透明玻璃饾金蕉叶纹盖碗呈圆形，通体由无色透明玻璃制成，直壁，平底，碗盖和外壁阴刻饾金如意云头纹和蕉叶纹，质地润洁，光泽度较好，显示了清代玻璃工艺的高超水平。